

## 值得重新审视的“辙印”

——李准创作成败得失漫论

陈美兰

人，总要在生活征途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一个作家自然也会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留下鲜明的印记。因此，二十三年前，也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迈过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李准曾把他献给祖国的一个创作合集题为《车轮的辙印》，显然，这个命名是意味深长的。

李准，他是属于在新中国的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作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生活，投身火热的斗争，使自己的笔锋始终伴随着农村生活巨流前进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从一九五三年发表《不能走那条路》起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李准是驰骋文坛的一员骁将，他发表的小说有四十多篇、电影文学剧本八、九个，另外还有不少散文、特写和戏曲，在当时同辈的青年作家中是个硕果累累的丰收者。他走过的道路，被作为一种“明确而健康”的方向受到文艺界的关注，得到过党和人民的充分重视；他的作品，被认为“相当生动地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广大农村中几年来所经历的无比激烈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基本进程”<sup>①</sup>而受到肯定和推崇。

然而，当历史又过去了第二个、第三个十年后，特别是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人们对李准的创作，却又产生了一些截然相反的评价。诸如，认为他的作品只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应时之作”，“谈不上现实主义”<sup>②</sup>等等。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评论界，也发生在作家本人身上，前两年，李准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三十年来写了不少作品，有生命力的不多”，并把教训概括为四个字“运动文学”。<sup>③</sup>

从肯定到否定，本来是人们认识事物时往往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现在问题是，对李准创作这种笼统的裁决是否符合事物的实际？是否有利于作家今后在新的起点上迈步？人民培育一个作家很不容易，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二三十年来，他们沿着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大众的方向，在沸腾的生活中不断地探索着正确反映人民生活的道路。这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创建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对于最初的实践者来说，失败总是难免的，但也要看到，这种失败，却又往往是与一些成功的东西复杂地交错在作家的全部创作过程中，因此，我们今天的责任，就不止于简单地给它作个肯定或否定的裁决，而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阶梯上，通过对作家创作辙印的重新审视，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其成功之所在和失败的因由，从而获得对一个作家的准确评价。

李准创作包括的内容很广，本文试图只就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映方面的成败得失谈点粗浅看法。

李准是带着《不能走那条路》的呼声走上文坛的，这个呼声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为什么一篇情节极单纯、字数不及万的作品能在亿万人的生活中激起波澜？我们应该承认，这并不是某种主观力量所导致，也不仅仅出于对新生力量的支持，而是由于作品确实是从生活中来，真正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和文艺发展的需要。

《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农民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所提出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即，土改后的农村要注意两极分化。这对于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我国农村来说，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土改运动使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然而，几千年来来的私有观念，在那短短的几年中却还没有、也不可能随着旧有土地关系的消失而马上消失；更何况，土改运动也仅仅是完成了把土地交回大多数人手中的任务，而保留的仍然是个体私有的体制。这样，千年的私有旧习在个体私有的生活环境中又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膨胀，这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为了使自己富起来，而不管是否已经侵占了他人之所有，这种思想残存于还未完全摆脱私有束缚、更未经历过集体大生产实践的农民身上，也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只不过在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在被土改翻身、发展生产的欢乐所吸引，还未完全觉察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罢了。李准当时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业余作者，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够通过生活中日渐增多的土地买卖、放高利贷等现象，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中这种潜在矛盾，尽管他还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深奥道理上去阐明它，但却能从自己生活的真切感受中警觉到这种矛盾发展的危险后果，并通过艺术的典型化手段，把这个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尖锐地提到了人们面前。这完全是生活给他的启示，如果说是“应时”的话，它正是应生活之需，应历史发展之需，这种“应时”，不是什么过错，而恰恰是我们的文学对生活应负的责任。事实上，当时对于生活中这种异常现象，党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及时采取了引导农民群众在自愿基础上实行互助合作的措施，以共同富裕的优越性来克服两极分化的危险。倘若李准刚发表《不能走那条路》还只给人们以震动，那么，后来的生活实践则进一步证明了他这篇作品的历史功绩，证明了它不是一篇过眼烟云的“运动文学”，而是一篇来自生活实践又推动生活前进的有历史价值的作品。

李准这篇作品引起文坛的重视，除了它的社会意义外，还有它文学本身的原因。建国后，我们的文学创作正面临着如何正确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如何从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揭示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这样一个新课题。为此，文学工作者正开始了多方面的探索，而李准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这种探索闯开了路子。诚然，他的经验并不完全是成功的，但毕竟是第一次大胆地触及农村现实中的新矛盾，为人们注意这一新的创作命题，打开了思路，从这一角度来看，李准来到文坛的意义也是不可抹煞的。

李准第一篇作品取得的成功，说明了他走上文坛之前就有着较充分的生活准备。和农村生活、农民命运的天然联系，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换期中出现的一代作家的一个十分可贵的传统。当然，较之从民主革命战火中过来的老一辈，李准的经历相对要短浅些，但他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熟悉农村中“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昔日农民群众在黄河两岸这条“饥饿的走廊”上挣扎的苦难以及今天成为土地主人的欢乐，都和他的心灵息息相通，因此，农村生活的每一个哪怕是微细的变动，都会在他思想上引起敏锐的感应，农民群众的每一点忧戚与喜悦，都会在他感情上掀起波澜，这是生活为他的创作所提供的重要基础。再加上解放后他对科学社会理论的自觉掌握，就更使他获得了认识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时，生活对他就不只是“包着的璞玉”和“堆积零乱的砖块”，而是“充满着颗颗珍珠。”④正如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学习，

“使我对整个人类历史了解了，也使我对整个农民阶级解放的道路了解了。我对农民这个阶级有了比以前更为亲切的感情，对这个阶级的命运前途，也有了更加浓烈的兴趣”。<sup>⑥</sup>由此看出，决定李准成功地迈开第一步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生活基础，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这二者的结合，就使这个年轻的作者犹如一株茁壮的树苗，既有肥沃的土壤，又有充足的阳光，从而迅速地绽开了第一个花蕾。李准在创作起步时所留下的这个脚印，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当然，有了正确的起步，不等于路途没有曲折，而李准的道路受到干扰，恰恰也就出现在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不能走那条路》固然敏锐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令人警觉的问题，但在揭示这种矛盾时，确实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作品在批判自发倾向时，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宋老定这样一个虽有落后思想，但却勤俭朴实、热爱劳动、眷恋土地的农民身上；而对于不好好从事农业劳动，倒腾牲口，一心想吃“飞利”的张栓，却轻轻放过，缺乏应有的批判。这反映了李准对生活矛盾的把握尚有偏颇，对于什么才是农村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倾向的危险在哪里，认识还是朦胧的。对这问题，当时文学评论界就曾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过看法，<sup>⑥</sup>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正确途径自然是应该引导作家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进一步加深对解放后农村所出现的复杂社会关系的了解和研究，从而获得对生活更准确的反映。但可惜这种正确意见当时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样，一方面，作品暴露出来的明显不足，被一些对作品过誉的赞扬深深掩盖着；另一方面，在评论作品的成功时，那种所谓“及时配合政治斗争”的“引导”则被强调到过份的地步。由此，也就使李准开始片面地认为“政策观点”可以替代自己对生活的真切认识，他在总结《不能走那条路》的体会时，就明确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必须从政策观点来加以估量”，于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继续开掘生活的宝库，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和真知灼见。

本来，政策是人们在认识生活过程中为解决实际矛盾而制定出来的措施，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它应该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因此，政策的正确与否，还需经受生活实践的检验。如果仅仅把它作为创作的唯一依据，作为认识生活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以它来框正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这就直接违反了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必然导致认识与实践关系的颠倒，使创作的航船从“最广大、最丰富”的生活海洋中驶进人为的狭小的通道。在《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的一个时期，李准有些作品就较明显地留下这种指导思想痕迹。象通过一把双铧犁的使用，说明在生产中坚持依靠贫下中农路线的重要的《大风雪里》；反映社办托儿所筹建过程的《农忙五月天》；还有直接宣传植树计划的《林业委员》等，都是根据合作化运动中某个阶段要宣传的具体问题而编出的故事。这些作品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特定时期贯彻某种政策措施的需要而受到过较高的评价，但毕竟因为缺乏对生活更广泛深刻的开掘和描写，缺乏对生活中人的思想性格的深刻研究，以至造成作品思想内容简单化，人物性格也消融到一定的政策原则里。这样的作品，时过境迁，当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 二

倘若李准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那么，他后来的创作就不可能再放射出生活的光采。庆幸的是，在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航程后，当人们问他如何使自己创作有新的突破时，他终于又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生活中找阶梯”。<sup>⑦</sup>

一九五八年，李准带着全家又一次回到农村落户。这个时期，他在创作思想上有一种显著的变化，他对生活的探索，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生活进程的了解，也不满足于对某些生活现象的熟悉，而是开始把观察生活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的身上。他在当时写的一篇创作体会中说：“这几年，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人民身上蕴蓄着的创造性，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昂扬斗志，看到了‘勤劳勇敢’这四个字所放射出来的光芒，看到新人物的成长，新的品质和性格的形成。”<sup>8</sup>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开始着力于对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研究。

“表现生活还是需要活生生的人”，李准这一见解，表明他对生活的认识大大迈进了一步。文学总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东西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的，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它身上总要折射出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色泽和音响，因此，抓住人的研究，也正是抓住了认识生活的关键。当然，要深入研究和描写具体的人是不容易的，德国古典作家歌德曾经说：“我知道这个课题确实是难，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他把解决这个“课题”，看作是“艺术的真正高大的难关”<sup>9</sup>。而李准，正是在闯这个“真正高大的难关”中，产生了《李双双小传》这样的优秀作品，从而使他对生活的反映走上了一个新的高点。

在《李双双小传》问世不久，茅盾在《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中就指出，这篇作品“以个别反映整体的原则，表现了公社运动前后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自然也包括人的变化。”这个论述是十分中肯的，小说确实“摆脱了写事件和写具体政策的范畴”<sup>10</sup>，而把笔力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李准曾不止一次兴奋地回忆自己在生活中捕捉李双双这一艺术形象的有趣经过：有一次，他在某个生产队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女共青团员发现村里几个妇女结伙偷了队里的庄稼，她不徇私情，勇敢地向公社揭发了，那几个妇女怀恨在心，就趁她到地里干活时围攻她，打骂她，撕她头发，而这位共青团员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始终没有屈服。这件事就象一道闪光在李准的脑海中划过，使他看到了生产关系变革中一种新的品质正在人们身上形成，他“激动得不能平静”，立刻产生了写这种人的强烈愿望。生活萌动了他的激情，但李准没有满足于这一点感受就匆忙提笔，他坚持在生活中继续广泛深入地进行大量的细致观察，以后，他又遇到了一个、两个、无数个李双双式的妇女，从她们身上获得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和富有个性特征的言谈、动作和生活细节，对她们的思想品质和精神世界不断有新的发现和了解，就这样，日积月累，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终于在作家脑海中孕育成熟了。

显然，李准笔下的李双双完全不是作家为了表现某种事件或政策需要而找来的一个抽象概念的依附体，而是从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富有时代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新人。我们读完作品，谁能忘记李双双她那火辣辣的性子，她那果敢利索的行动，她那锋利活泼的言词以及她那爽朗乐观的音容笑貌啊！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个性格鲜明的农村妇女，感受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认识到在这种新的典型环境中出现的一代新人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敢于斗争、见义勇为的崇高思想品质么？李双双这个形象经受了千百万群众的检验，并在他们生活中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不少农村社队希望自己的集体里多来几个李双双，这就是人民群众对这一艺术形象朴素的然而却是崇高的评价，也证明了文学要反映生活、推动生活前进，就要坚持研究人，“从写人出发”的道路的成功。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随着历史的流逝，《李双双小传》固有的弱点也确实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作品所选取的公社办食堂的事件是缺乏生命力的，没有经受起客观规律的检验。实践证明，它是集体化中的一种冒进行动，而李准却将李双双放在这个事件中来塑造，这就不能不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个在实际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富有时代特点

和个性特征的新人，却从事着一件不合时宜的工作。这种安排自然会给这个新人形象带来一定的损害，也会使这篇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种交织在成功创造中的败笔，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我认为简单地又一次把它归咎于作家的“赶浪头”，是不公平的。因为李准创作这篇小说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去歌颂农村大办食堂这一事物，他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于歌颂我国劳动妇女以凌厉非凡的革命锐气向千百年来的社会旧习发出挑战，要求从家庭的繁琐劳动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个人身上的聪明才智汇集到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去的果敢行动；歌颂一种较之小农经济下的自私心理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精神世界。这种创作立意，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主要产生在：李准在专注于对人的研究时，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没有认真地去探究人的行动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间的联系，探究他笔下人物进行活动时的“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sup>⑩</sup>他只是从社会变革这个大的方面去认识他要塑造的人物出现的必然性，而没有认真思考这个人所从事的具体活动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这，正是造成《李双双小传》的矛盾现象的关键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人的时候，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去考察的，因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sup>⑪</sup>人的活动，人的思想性格，只有在与社会复杂缤纷的现实关系的交织中，才能显示其特点和意义。一个人他可以具有顽强执着、大胆泼辣等等品质和性格，但在与符合历史前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时，才会真正闪现出动人的光华；如果相反，也就是说，超越了这种发展或延误了这种发展，那则是毫不足取的。所以，文学家们研究人时，绝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方面，更不能仅仅“从只有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sup>⑫</sup>这点，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一反“四人帮”那种忽视生活中人的价值、抹杀人的个性的创作浊浪，又开始注重于对人的研究，兴致勃勃地去探索人的“心灵秘奥”时，李准过去的足迹，更应为我们所记取。

对于《李双双小传》中的矛盾现象，李准在作品问世不久就觉察到了。六二年他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很果断地给人物“搬了家”，撤去了办食堂的事件，把李双双放到修水利中去表现，并且抓住了工分问题，描写人物在维护按劳取酬原则中的大公无私精神。由于人物鲜明的个性化，所以，尽管事件变了，但人物的基本性格并未改变，李双双仍然是李双双，同时由于她所进行的斗争更符合历史发展精神，人物的现实性就更增强了。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李准当时还没有从对作品的这一重大改动中，找出自己创作问题的症结，因此，也就未能在正视这个教训的基础上使自己探索生活的步子更往前跨进一步：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考察他所熟悉的人们所从事活动的历史价值，作出合乎客观规律的判断和取舍；相反，在六二年以后社会矛盾变得愈加复杂的情况下，他的创作步子却在明显地退缩，对社会真实的现实关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于是，创作又出现了低潮，产生了象《麦仁粥》、《进村》那样一些与现实生活距离甚远的作品，这样，它们遭受历史淘汰的命运当然就不可避免了。

### 三

十年动乱，夺走了李准的创作年华。在那严寒封冻的日子里，李准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在受到一番残酷批斗以后，被“四人帮”以“流放农村”的惩罚，驱逐到河南西华县“劳动改造”。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巨变，促使李准的思想又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使他对历史、对现

实、对未来都产生了新的认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凝聚着他在动乱的十年中，对生活思考的结晶。

一九七九年当这部小说出版时，可能由于它的题材与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大河奔流》大致相似，因此，还未引起社会广泛的兴趣和认真的注意，但是，当对它进行了一番仔细的鉴赏之后，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大大地超过了电影，它不仅是李准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建国三十年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相当水准的佳作。它集中体现了李准在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风暴后正在冲破过去创作的一些陈旧框框，在认识生活与反映生活上所出现的新特点。

作品取材于黄河两岸人民的斗争生活。它把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扒开花园口的事件作为序幕，以广阔的历史跨度，描写了在这场历史性的灾难中，黄泛区人民在党领导下战胜黄河，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在荒芜的沙原上建设新世界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李准说，他写这部作品“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而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sup>④</sup>这种高远的创作立意，突出地反映了李准艺术上的雄心壮志，反映了他正力图使自己的创作向着历史的深度与广度进军。

在小说所展现的悲壮历史画面中，活动着的是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纯朴可爱的普通劳动群众。作品是从构成社会的一些家庭“细胞”中着笔的，它集中写了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等七户农民的命运。尽管他们的经历各不一样，但都深深眷恋着、并用汗水浇灌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情的黄水淹没了他们的家园，却扑灭不了他们生存下去的热望，不管流落到哪里，他们都象大树的根须，紧紧贴附着大地，用劳动的双手，相互扶持，顽强地开辟着生活的渠道。作家把他的描写注意力放在这些极为平凡普通的劳动者身上，充分展现出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品质，意志力量，聪明智慧和美好心灵世界，从而揭示出这就是我们古老祖国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民族能够战胜各种历史灾难而不被灾难所压倒的力量渊源。这种对生活的深邃认识和对人民力量的无比坚信，使小说处处闪耀着他过去作品所没有的发人深省的思想光芒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对生活的描写上李准的笔力也有明显的进展。他塑造人物，不仅保持着过去的泥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而且更注意写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以及人情世态在人物身上所留下的影响和形成的复杂性格，使笔下的艺术形象更富有生活的厚度和历史纵深感；在民族色彩的体现上也给人以新鲜的印象，他在熟练运用乡土语言的基础上，更执力于去追求把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熔进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面中，把乡土美与乡土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使人在获得美学享受的同时，也获得民族高尚情感的熏陶，象“水上婚礼”、“黄河试篙”等生活场面的描写就是一些充满艺术魅力的令人难忘的篇章。

当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迈进新的历史时期后，李准不仅能够明显地克服了前一时期创作上的某些缺陷，继续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创建，而且能够出现思想、艺术的新突破，这在中老年一代作家中是颇不容易的。究其因由，恐怕仍然是从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中去寻找。

动乱的十年，在与黄河两岸人民共渡患难的日子里，李准的生活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与群众朝夕相处，同尝甘苦，互通心曲，人民群众的宽大胸怀使他获得了一把认识事物、认识自己的公正的天秤；而他也在替群众写家信、拟祭文、记家史这样一些朴素交往中又深入地了解了上百个农民家庭的命运和遭际，了解了他们在新的历史变动中的思绪和情感。“深恐笔底淋漓尽，卷帘梳洗看黄河”，黄河人民的血与泪、爱与恨，进一步锤炼了他的阶级感情，坚定了他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也使他的创作仓库得到新的充实。他说，“还是要写，要写中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要写中国人民顽强的生活能力，要写

他们高度的阶级感情，要长一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信心”。<sup>⑮</sup>因此，当灿烂的阳光又重新照耀祖国大地时，李准就象压在严冬冰雪下吸足了大地养分的麦苗，在春晖下立即变得生机勃勃，带着人民群众在经历一场新的浩劫后的深沉思索，开始了《黄河东流去》的创作。

生活是孕育作家的土壤，也是促使作家前进的动力，李准在沉默十年后思想和创作的新突进有力地向人们证明了这点。过去的生活原料，固然给创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但生活不同于资金积累，不能靠吃老本，不能一本万利。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生活，总为作家们观察生活的视野延伸着一条无穷无尽的道路，作为伟大生活的一名记录员、描绘者，只有把自己的身心与发展着的生活紧紧相连，才能使自己的创作生命常青。就这方面来说，李准的经验还很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然而，李准自己目前似乎还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黄河东流去》(上)问世后，他的创作看来还在徘徊，固然，最近也写出了象《王结实》、《一个精灵的出现》等较好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但仍使人感到他还没有执着地沿着他的突进去迅速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新路子，而是有些又为一时表面的浪潮所左右，我们从他发表的所谓追求“灰色的幽默”的个别短篇，可以觉察到这一点。在一个历史大动荡、大转折关头，在文学现象纷纭复杂的情况下，一个作家如何选定自己的道路，确定自己的追求，看来这个问题不仅对青年作家来说是值得深思的，对象李准这样有着较长创作经历、并在生活中已形成自己鲜明特色的作家来说，也同样是值得深思的。

李准从进入文坛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三十年来，他从一个普通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著名作家，他所走的道路，尽管充满荆棘险阻，屡经挫折，但毕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投身群众火热斗争，努力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宽广道路；是一条坚持从生活中找阶梯，不断向着新的艺术高峰攀登的艰苦而又光荣的道路。他在这条道路上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曾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增添过新的光彩；而他在这条道路上所得到的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也将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财富。历史的足迹，常常会为我们通向美好的未来提供了指南和勇气，现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经过战斗的洗礼正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奔腾向前，我们相信，“决心用一切力量来为这个事业奋斗”的李准，一定会把准舵向，以更新的成就为这个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 注释：

- ① 冯牧：《在生活的激流中前进》，《文艺报》1960年第3期
- ② 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讨论综述》。
- ③ 见《文艺报》1980年第1期：《“文艺的社会功能”五人谈》。
- ④⑤⑦ 李准：《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文学知识》1959年第12期。
- ⑥ 见《文艺报》1954年第2期李琮的文章：《〈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
- ⑧ 李准：《我喜欢农村新人》，《电影艺术》1962年第6期。
- ⑨ 《歌德谈话录》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⑩ 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6日。
- ⑪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 ⑭ 李准：《〈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
- ⑮ 引自《河南日报》1979年3月21日通讯：《我行我素写江山——访作家李准同志》。